

□ 张世勤

千万别问我“最近哪一本小说最好”。这话应该放在我看《看见》之前问,那样我可以扭扭捏捏地说上一些较为着调的话。现在问,我可能会说:《看见》。

《看见》是小说吗?显然不是。它是一个小女子把自己放在生活的油锅里滋滋煎熟后的成长和思考。此前对这类书或这类人出的书我抱定“只景仰,不翻阅”的态度,这次也不过是随手一翻,但却没有停下来,直翻到了最后一页。它吸引了我,吸引我的不是已经被时间淘洗的事件,而是事件中的故事脉络、人物关系、语言张力、现实场景、浓烈氛围,这是第一个层面。第二个层面是散落或说弥漫其中的强烈自省意识,倔强的叛逆与可爱的执著,尖刻的思索与真诚的感悟,调侃的温馨与狂放的进取。它引领我展开了对人生与命运、性格与成长、理想与现实、社会与家庭、奋斗与友情、思维与方法的重新思考。

读完一遍,合上书,一个人物却仍像雕塑一般立在字里行间,他们双脚沾满旷野的泥土,脸上飘扬着人间的浮尘,眼里透着对生活的渴望和追问。镜头后的柴静成了一位素描手,三笔两笔便为我们还原了栩栩如生的人物,他们在既波澜壮阔又波诡云谲的生活舞台上,做着生命的表演,或落寞无助,或精彩惨烈,或丑陋可憎。我不愿把那些事件看做事件,或许事件本身并没有多少意义,我看到的是由此摊开的一个个陌生遥远却又真实可触的生活场景。这里有没穿隔离服、戴口罩眼罩和手套的医生、护士,有因青春问题而烦恼的少年,有被戒毒所卖去卖淫的吸毒女,有丑陋的商人和蝇苟的官员,有江湖耍猴人,有被灾难夺去家园和孩子的夫妻,有人造的老虎,有洋志愿者,等等。她的职责和选择,让她没有领我们看遍野烂漫的山花,听流水轻唱,细语欢歌,却插开一条布满矛盾的河流,让我们看失控的河道和河水中夹杂的尘沙,然后让我们自己从怒吼咆哮和忧伤惨烈中寻找宁静和温馨的答案。

《看见》
柴静 著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2013年1月出版

柴静『看见』了什么

「成长告白」

她把骨子里的文艺气息,在一件件添堵的事件和端坐的当事人面前,一层层剥下来,留给了犀利的追问和宽容的探讨,然后落成了书中雨点一样敲打的文字。她一定渴望换一种姿势,跟我们重新说谈,那些过往,那些回忆,那些温情,那些忧伤,还有那些困惑。生活中的是是非非,在简洁文字的包装下,即使时过境迁,也并没有减缓它的冲击力,一次次袭击了读者的心灵。她在场,却故意冷眼相向灵魂与灵魂之间的互相折磨与博弈。她试图用这种方式解开与拯救。

她刻意回避着“我”,没有把自己成长的背景、亲人的关爱和她对他们的追念集成为一个段落,而是把所有这些富有温情的色彩,泼洒在似乎完全不相关的场景之中,让任何一处灰色生活的描摹都有了外来光亮和饱满底色,让人性的光芒充盈其中。正如她把与领导、与同事的交往也不断拆散开来一样,让每一章节的主体事件不那么孤立,不那么生硬,不那么缺少人情和人性,确保自己所拿出的每一块布料都有粗糙或细滑的真切质感。

与其说她出色完成了工作,不如说她成功完成了内心赋予自己的使命。

偌大的世界,繁杂到哲学便只剩下两样,一样是现象,一样是本质。柴静看到了什么?她看到了一如我们所看到的,唯一的不是她借助镜头,试图把一切异样的现象努力变成真相。在这其中,读者看到了一个叫柴静的不一样的女子。如果用放大镜照一下,那绝对是一个公民凌厉的背影和坚定的步伐。

我之所以无厘头地把柴静的《看见》当小说来读,是因为它在客观理性的述说中完成了文学意义上的描写和塑造,富有艺术感染力、穿透力和启迪性,而且如果是小说,那些不该发生的故事和那些人性之恶便都不是真实的存在。这自欺欺人的把戏,我常常叫它理想,因为它是我心中难以熄灭的灯火。

你怎么难我不管,但面对长大的社会和前进的生活,我们必须时刻提醒自己:看见。

真诚是作家、艺术家最重要的品格,也是一种写作态度和应该持有的伦理道德。一旦将真诚从人生底色中抹去,去之以虚伪、算计、世故等,就意味着艺术的崩溃和作家、艺术家的彻底毁灭。孟宪杰先生收在文集《生命里的村庄》中的诸多篇什,无一不是真诚地面对世界、面对个人、面对人生。他同祖国和人民一起经历了曲折坎坷,体验了荣辱沉浮。对于发生在历史进程中的“大跃进”、饥饿岁月、“十年浩劫”以及改革开放中的某些弊端和阵痛,他都以一个作家的“手眼”去感知和发现,并最终落实到审美观照之中。我想,他的成功之处,就在于他挣脱了既定概念的捆绑,超越了某些“现实真理”的规定性,充分调动了艺术主体内在的能量,剔除了遮蔽在生活表面的幻影幻象,走进了生活本真本然的深处。在《生产队里的激情岁月》中,面对公社书记的空洞说教,“我有个习惯就是坐下便睡”,于是遭到公社书记的批评:“这个孩子,胡吃闷睡,不讲政治。”紧接着文本中的“我”有一句内心独白:“什么政治,政治就应该让老百姓吃顿饱饭。”这一内心独白,不仅揭示了那个年代的荒诞,而且彰显了作家深刻的反思意识。

反思是作家应该承担的道德责任,也是文学的内在要求。反思的缺席,必然导致艺术的苍白,同时,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一个民族精神品格的萎缩。孟宪杰先生在这部著作中,对历史以及现实的认知和观照,都超越了世俗视角,在形而上的层面上切入对象主体,使作品不仅获得了艺术的张力,而且展露出思想的锋芒。在《情系吉东》中,一场普通的同学聚会,在畅所欲言的氛围中,一个老党员(老林)潸然泪下,动情地说:“人为什么活得那么累,不就是因为有过多的欲望嘛,追逐名利,算计别人,真是大可不必。来世一遭,匆匆忙忙,奉献社会,享受生活。”在我看来,这也是作者的内心告白和人生追求。像这样对人生富有洞见的哲理性思考,在孟宪杰先生的笔下,可谓俯拾皆是,如《广场独语》、《三下周村》、《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生活》、《坚守》、《享受孤独》等,无不给人以真的启迪,善的滋养,美的享受。由此可见,在这个物欲横流的时代,孟宪杰先生仍然听从自己内心的指令,通过文字将一颗清静高贵的灵魂和对人生深刻的感悟呈献给读者。

认真深刻的反思,需要个人良知的烛照,没有良知的呼唤,反思只能被既得利益者无情地悬搁,同时也会泯灭温馨的人文关怀。作者深谙此道,所以他以丰沛的人道主义激情去表现那些底层普通人的生存困境,精神困境以及对美好生活的向往。在《灵芝》中,他用温润的文字,送给我们一个鲜活的女性形象,从她起伏跌宕的婚恋经历中,我们触摸到造化弄人的真实生活,上演了一幕大历史变迁中小人物的悲喜剧。村子蒙受不白之冤,喝农药死了,撕开了那段荒诞历史的一角。在老拐的理发店里,我们领略了别一种情味。老拐以菩萨心肠收留了一个因逼婚而出逃的漂亮女孩,当老拐爱上她时,她却悄然离开了。作品到此戛然而止,给我们留下无尽的遐思、苦涩的感叹。面对一个个命运多舛的小人物,在对现实生活进行审视与追问中,孟宪杰先生将人生的不幸与困境化作爱,给予同情与关怀,奉献出作家的良知,也走进文学的内部,写出这样好的作品。由此看来,只有超越现实功利,充满人道激情的文学,才会赢得永久的魅力,在时间维度上实现自身的存在价值。

行走在《生命里的村庄》里,既同孟宪杰先生相逢,又和他笔下的许多不同经历、不同命运的人物相逢,可算是一次十分温暖惬意的审美旅行。在这里倾听历史的回响,注视现实的风云,感慨良多。孟宪杰先生生活在文化中,懂得文学之真谛,在灵魂上也称得上是一位高洁之士。我欣赏这种抵达心灵深处、守望文学真理的作品,我敬佩这种超越现实功利、坚持文学立场的作家。

□ 孙国章

【阅读随笔】

文章不与政事同

□ 周鲁霞

马克思·韦伯在1919年作的两次演讲声名至今。无独有偶,北美独立前,英国政治家埃德蒙·柏克(1729-1797)也曾作过“论课税于美洲”、“论与美洲和解”两次著名的演讲,这两篇演讲,加上他的“致布里斯托长官书”,被缪哲先生选译后冠以《美洲三书》出版。

韦伯的两次演讲中,对政治家——有资格把手放在历史舵轮柄上的人——应具备的素质作了大致的勾勒。对此问题,柏克在演讲中也多有涉及,且与韦伯持大致相同的看法。比如,柏克认为,政治家就是要“意识到自己的地位,并以火样的热诚,以不忤于我们身份与品格的方式,去履行我们的职责”;政治家要善观政治之“天象”,“看到地平线的一角处有巴掌大的云彩,就知道那是飓风,就会躲进最近的港湾里”。柏克所论,皆不出韦伯的激情、责任、判断力之范围。

若细究之,柏克对政治家素质的要求与韦伯又有细微的不同。在激情、信念以及道德方面,柏克就调门甚高,甚至不乏理想浪漫之色彩,与韦伯对信念伦理之陷阱的警惕形成鲜明对照。柏克认为,政界之人应是群众的“真样品”,“他们若普遍地败坏,社会就绝不是健康的”,因此,在政治中,“宅心于高尚,绝少不是最真正的智慧”。政治家就“应将自己的心灵,擢拔于崇高的境界,以无负上天命我们接受的委托”。粗鄙的政客群氓,堪称政治之机械工者,绝无资格做伟大航程的舵手,“就是运转这机器上的一个小轮子,他们也不配”。柏克所论,颇具“好人政治”的意味,与中国古代的风过草偃、古希腊的贤人政治并无二致,其身后的卡莱尔(1795-1881)、阿诺德(1822-1888)等皆有其余韵。柏克生活的时代,政治之行政化、技术化趋势已经确立,对此他并不笼统地反对。柏克认为,“国事倘不脱正常的秩序”,出身于官衙的人以循常蹈故的作风,也可以做到事功斐然可观;而一旦社会处于转型、非常时期,对执柄者素质之要求便陡然提高,他们甚至就是“国家的路标与灯塔”,非具高尚的品行、丰富的学识、敏锐的洞察、坚强的意志者皆不足以胜任。在柏克看来,其时的英国,恰是一个需要“路标与灯塔”式人物的关键时期。

由于把政治看作一项神圣、崇高的托付,所谓的责任,自然也就成了一种志业和使命,因此,在柏克身上,激情与责任是和谐统一的。对于政治家的责任问题,柏克并无更多的泛泛而论,他关注的焦点是如何以高超的政治智慧完成所托。同样两篇著名的演讲,韦伯是以学者身份对政治进行哲学思考,柏克则是作为政治家在实战层面的挥洒。所以,译者缪哲先生说,对政治家或用心于实际政治的普通人,柏克这些叹为观止的文字,堪称政治智慧的源泉。

步入政坛之前,柏克已经是位小有名气的文人,他的演讲着实显示了不凡的文学才华,但柏克又并非是托克维尔在《旧制度与大革命》一书中所讥讽的那类文人政治家。这类文人政治家“崇尚普遍思想,崇尚体系,崇尚夸大其词”,虽无政治经验、不通政治事务,却极热衷于谈论政治,民众因为愚昧对他们“言听计从,衷心拥戴”。托克维尔认为,法国大革命前,正是这类文人成了“首要政治家”,控制了舆论,把法国政治生活“强烈地推入文学之中”。文章不与政事同,“在作家身上引为美德的东西,在政治家身上有时却是罪恶”——这是托克维尔对法国大革命深刻反思后的结论。其实,早在托克维尔之前,柏克在《法国革命论》一书中就对此种文人的浪漫已经多有深刻的批评,柏克的思想应该对“晚辈”的托克维尔有所启迪。

与欧陆唯理主义哲学不同,英国文化奉经验主义为主臬,政治思想被深深地打上保守主义烙印。作为保守主义的鼻祖,在政治的操作层面,柏克坚决反对浪漫文人的笼统、孟浪和乱投虎狼之方。约翰牛的信条是“崇尚传统,膜拜经验,修修补补”,他们总是遵循有益的经验,而不是有害的理论;总是把政策建立在事实上,而不是想象上;愿享既有的东西,而不寄希望于未有的东西。柏克的政治言行所以具有极高的政治智慧,与其保守的政治理念关系甚大。要言之,柏克最令人瞩目之处,是对信念与责任、激情与客观、目的与手段的平衡和拿捏,技艺之高超实非托克维尔、韦伯所能比肩。对政治,柏克既以近乎神圣的态度待之,又谨慎地规避着文人的浪漫,以免把事情搞得更糟。柏克奉审慎为政治家之美德,在作任何决策之前,先对自己的才能抱以不信任的心,对问题的考量“审之入微,面面俱到”,“绝不依据匆匆的一瞥和一孔之得,便做出决定”。他力求做到的是:“不曾有哪个男子的生命,因我们的鲁莽而丧失。不曾有凄苦的寡妇,因我们的无知而泣尽继之以血。”若依此论,不乏激情的柏克对信念伦理的警惕,与韦伯又实在惊人的相似。

细品《美洲三书》,多次想到古希腊政治家伯里克利,大概因为他也曾有过著名的演讲,以及他临终时的那句话:从未有一位公民因我而披丧服!



《生命里的村庄》
孟宪杰 著
百花文艺出版社
2012年9月出版

深刻的反思需要个人良知的烛照

「灯影书香」



@必读呢本:在西方文化传统中,“贪吃”被列为七宗罪之首。当饮食成为人类过分沉溺的欲望,其他一切淫邪的罪错便随之而来。在梁文道笔下,吃喝不仅仅是满足口腹之欲,而是人类社会文明的切片,它与音乐、民族、教养、情色甚至善恶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。——梁文道《味道之第一宗罪》

@黄老邪:《话题2012》,杨早、萨支山主编。发生在2012年的十数组现象以话题讨论方式展开,深入而多元。读完它,或原景重现,或恍然大悟,或不堪回首,而一年间落满不安,粘满焦虑的种种羞愤喜乐亦可自此整饬收藏。“情绪是有史以来最易消散的东西,但又是史以来流传最恒久的物事。”杨早所言极是。

@深圳小刀:《昨天的云》,王鼎钧先生“由绚烂归于平淡”的回忆录四部曲之一。无一笔惯常的愁苦怅惘和伤春悲秋,不留一丝花腔和浮华。真正的好文章,果然是平淡文章。“回想起来,离家这一幕还是草率了。这等事,该有仪式,例如手持放大镜,匍匐在地,一寸一寸地看。”读到最后这淡淡一句,心中惊雷滚滚。